

邓小平学术研究思想对高校的影响

李爱民

(华中科技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邓小平的许多理论和思想催生了一系列重视科学、重视研究的方针政策, 深深地影响了高校学术研究工作。他重视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 强调高校的学术研究职能, 善于调动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倡导学术民主、自由、创新, 反对学术污染, 支持学术交流, 鼓励拓宽学术研究视野, 为高校学术研究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改变了一代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学术命运。要认真研究、深刻领会他的有关理论 and 思想, 继续指导高校今后学术研究工作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关键词】 邓小平理论; 高校学术研究; 影响

【中图分类号】 A8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 (2005) 01-0002-04

学术研究是高等学校的重要活动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 高校的学术研究工作经历了许多的艰难曲折, 如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高校的许多学科从无到有, 从弱小到强大, 高校学术研究更是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究其原因, 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功不可没。邓小平的许多理论虽然不是直接针对高校学术研究提出来的, 但他的许多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高校学术研究工作的发展, 甚至改变了一代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学术命运。

一、重视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 为高校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外部环境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是邓小平对当代世界发展规律性的新概括和新论断。这一概括和论断, 对高校乃至整个社会重视科学、重视学术研究影响十分巨大。邓小平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自身特点和对我国紧急发展的科学分析, 充分肯定了科技发展对现代生产的制约作用。在分析国外经验基础上, 从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角度和现代化建设战略全局的高度, 他明确指出: “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从何着手呢? 我想, 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1] 1978 年 3 月, 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邓小平指出, “四个现代化, 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

现代工业、现代国防。”^[1] 1992 年,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 重申了这一观点, “我们自己这几年, 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这么快吗? 要提倡科学, 靠科学才有希望。”^[2] “中国要发展, 离开科学不行。” “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 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 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2] 邓小平还明确指出, 科学不单纯指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在总结了国内外科学研究的经验后, 邓小平强调指出, “科学院和大学可以多搞一些基础科学, 但也要搞应用科学。”^[1] 他还说, “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 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 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1] 这些论述, 为高校选择学术研究方向进一步指明了方向。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是邓小平对我国教育提出的总要求。对于高校学术研究而言, 这一要求也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意义。面向现代化, 要求高校学术研究要密切结合当前的实际问题; 面向世界, 要求高校学术研究要有一个开放的、全球视野; 面向未来, 则是要求提高学术研究的前瞻性。

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和教育的一系列思想, 催生了一系列重视科学、重视研究的方针政策, 不仅为高等学校学术研究的迅速兴起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和良好的社会大环境, 而且为高校如何开展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 正是在这些思想指导下, 高校学术研究在 1978 年以来不断走向发展和繁荣。

【收稿日期】 2004-11-30

【作者简介】 李爱民 (1972-), 男, 山东莒县人,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 山东农业大学讲师。

二、强调高校的学术研究职能，为高校开展学术研究创造了条件

众所周知，建国后，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长时期内“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置于一切工作之上，高校也不例外。特别是“文革”十年，推残了知识，也摧残了高校学术研究。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学校成了阶级斗争的主要阵地。高校研究人员学非所用，浪费极大，加上对高等学校采取“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高校完全没有了学术研究的氛围，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没有了学术氛围的高校，学术研究工作一度接近停滞。

高等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也是开展学术研究、发展创新知识的基地。19世纪初，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在创办柏林大学时，就主张大学应当是教育与科研并重：既要传授知识，也要从事科学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改革北京大学的实践中，也强调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学术研究。邓小平深刻洞察到了这一点。1978年，中国历史将邓小平推向前台，他关于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高等学校不仅应该成为教育的中心，而且应该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的思想，正是对上述中外优秀高等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邓小平看来，凡是高等学校都应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它不仅是国家整个科学研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学校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职能的充分发挥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977年他就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这一点要定下来。它们有这个能力，有这方面的人才。事实上，高等院校过去也承担了不少科研任务。随着高等院校的整顿，学生质量的提高，学校的科研能力会逐步增强，科研的任务还要加重。朝这个方向走，我们的科学事业的发展就可以快一些。”^[1]对于重点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和为何开展科学研究，邓小平也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例如，他认为高等学校既要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也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他还提出高校在从事应用科学研究的同时，可以多搞一些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科学研究的能力和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应用科学研究也是利用基础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寻找在生产和社会进步方面应用的可能性。因此，邓小平在提出高等学校特别是工科院校也要搞应用科学的同时，主张高等学校像科学院一样，可以多搞一些基础科学研究，这是颇有见地、发人

深思的。这些思想是基于他对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高等学校尤其是重点高等学校在创造新知识、发展高科技方面的重要地位的深刻认识，以及对我国高等学校学术研究力量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既反映了高等学校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了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也符合我国高等学校发展的实际状况，为高校学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1]为了保证高校更好地开展学术研究，邓小平提出要贯彻简政放权的原则，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增强高等学校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赋予了高等学校在开展学术研究上的诸多权力，比如，高等学校“在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科学研究任务的前提下，可以自行决定参加科学研究项目，承担其他单位委托的科研任务”，可以“自行决定单独设立或与其他单位联合办科学研究机构或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等。^[3]由于有了政策和法规上的保障，不少学校积极挖掘潜力，开展学术研究，极大地促进了高校学术研究的开展和繁荣。

三、善于调动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为高校学术研究队伍建设提供了稳固的保障

高校学术研究要发展，水平要提高，学术研究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人员积极性的提高是关键。在这一方面，邓小平同志有一些精辟的论述，党和政府随后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极大地鼓舞和调动了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从事学术研究的积极性。

首先，邓小平的知识分子观保护了高校学术研究人员，稳定了学术研究队伍。学术研究人员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按照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科学论述，学术研究人员是属于“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本人并不是资本家，而是学者。他们的劳动成果为剥削者所利用，这一般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由选择。”^[1]不应该把学术研究人员同那些为反动统治阶级出谋划策的政客混为一谈。1981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转发〈科学技术干部管理工作实行条例〉的通知》中体现了邓小平这一思想。该通知指出，“中央认为，对科技人员，特别是在第一线作实际工作的中年科技人员，要尽可能改善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政治上受迫害还没有

落实政策的,要尽快予以解决。”^[4]文件还专门谈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技术干部,都是科学研究工作者,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可以参照这一条件的精神,制定单行管理条例。

其次,尊重知识和人才,改善研究条件,实行学术研究奖励制度,极大地调动了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开展学术研究的积极性。邓小平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1]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高度信任;在思想上严格要求,在专业上尊重、业务上提高,在生活上热情关怀。邓小平一再要求有关方面要反对空谈,注重解决知识分子的具体问题,“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1]针对这一问题,中央和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为学术研究人员提供必要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工作和学习条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实行定期考核和晋升制度以及破格晋升制度,还设立了不同级别的各种学术成果奖励制度。近年来,在国家各项重大成果奖励中,高校都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第三,重视加强队伍建设和增加科研经费,促进了高校学术研究人员的业务水平的提高,稳定了队伍。高校学术人员队伍建设和增加科研经费,是保证学术研究上水平的两个基本条件。邓小平同志一直强调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增加教育经费,并把这两大问题作为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和战略措施来看待。文革期间,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冲击,高校教师流失严重,学术队伍残缺不全,青黄不接;职称取消,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大专院校也应该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1]这一决定极大鼓舞了高校教师。高校教师职称在1980年恢复后,对促进业务水平、稳定教师队伍发挥了重大作用。此后高校科研和教学人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使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成为受人尊敬、值得羡慕的职业。最近开展的职业声望调查研究显示: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排在前列。

四、倡导学术民主、自由、创新,反对学术污染,为高校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学术自由是学术繁荣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学术界的要塞,永远不能放弃”。^[5]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

术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5]对于高校里的学术自由,美国高等教育学者赫钦斯认为,如果在一所大学里听不到与众不同的意见,或者它默默无闻地隐没于社会环境中,就可以认为这所大学没有尽到它的职责。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在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提出:“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主义’,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1]他反复强调,对于学术问题,要平等讨论,不能以势压人。学术与政治要保持距离,不能打着学术的旗号搞政治,也不能用政治的手段来压制学术研究。在学术问题上,必须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学术上的是非问题和不同见解,只能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不能用行政手段作结论,保障人人都有批评、申辩和保留意见的权利,对学术观点即使被科学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也不允许扣政治帽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努力贯彻“双百”方针,在高校内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

邓小平理论的基础和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也恰恰是学术研究必须要遵循的规律。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从经典、原则出发,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领导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开展真正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理论前提和社会环境。

学术研究贵在敢于接受挑战,强调创新。邓小平鼓励人们要大胆探索,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大胆试验,大胆闯,开拓创新。他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2]“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1]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刚恢复工作不久,针对过去被林彪、“四人帮”歪曲破坏的党的思想路线,针对当时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洞察力和胆略,领导和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他说,“不打破思想

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1]这在整个社会营造了一种探索创新的良好氛围，对高校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推动作用。

良好的学风和学术道德，是高校学术研究发展和繁荣的必要条件。由于“四人帮”的破坏，那些年在学风方面出了不少问题，例如压制讨论，互相封锁等。邓小平认为，科学“本身就是实事求是”，学术研究人员就是要“老老实实做学问，是不允许弄虚作假的。”^[1]强调“对于那些追求个人私利，互相封锁，不搞协作，甚至垄断、剽窃等等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错误思想和作风，应该进行批评教育。”^[1]1983年10月，邓小平针对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的精神污染问题，要求理论界、文艺界的同志，“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2]邓小平同志注重树立良好学风、提倡学术道德、反对学术污染的思想对高校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当前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支持学术交流，鼓励拓宽学术研究的视野，推动了高校学术研究水平迅速提高

科学研究作为一种探索性的创造活动，不可能没有不同观点。中国自明朝中叶至鸦片战争就已搞了300年的闭关锁国，这也是自西方工业革命后中西社会发展分道扬镳的关键所在。不能不承认，建国前和建国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落后，高校学术研究和学术条件与国外许多发达国家的高校相比差距非常大。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2]自70年代后期始，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开放，并在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开放的方针和政策，阐明了一系列的理论观点，为中国的经济发开展辟了广阔的道路，同时也为高等学校学术的繁荣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同志主张利用外国人的智力，把外国人请进来参加建设，搞技术改造，“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提倡学术交流；主张为要求回国的

华裔学者“创造条件，盖些房子，做好安置他们回国的准备工作”；^[1]主张派人出国留学；主张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以便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就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说：“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作出的关于恢复派遣留学生的指示，在1979年作出的关于社会学要赶快补课的指示，是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意义重大，也对我的学术命运影响至深的两个指示。”^[6]在邓小平上述思想指导下，我国在学术研究方面采取了种种积极措施，使学术研究从封闭走向开放，对我国高校学术研究发展和学术水平提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重视学术交流还体现在对创办学术刊物的大力支持上。学术刊物是开展学术交流、发展学术的园地，也是优秀学术人才成长的沃土。邓小平同志说，“学术刊物要办起来”。针对当时学术刊物出版难的问题，他专门指示，要解决一下科研、教育方面的出版印刷问题，把它列入国家计划”。在当时纸张紧张的情况下，强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刊物一定要保证印刷出版”。^[1]

当前，高校承担国家项目的能力明显增强，高校创新能力明显提高，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论文。我国高校的学术研究能有今天的繁荣，邓小平同志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他的有关理论和思想，继续指导高校今后学术研究工作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 湖北省教育委员会. 教育法规汇编(1980-1997.3)[M]. 1997.
- [4] 国家教委人事司. 教育人事工作文件选编(上)[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5]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 [6] 郑杭生. 邓小平的两个指示改变了我的学术命运[J]. 新视野,1999,(5).

(责任编辑:胡志刚 赵惠君)